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 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施爱国

(南开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关键词: 东方主义; 美国; 中国威胁论

中图分类号: D80; K71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67(2002)06-0103-06

—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直至今天的西方学术和理论领域,特别是人文理论的书写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心内容就是对“现代性”的重写。这一重写的表现之一是对以往西方学术史和学科史的批判。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出现在哲学领域,然后波及其它。承袭早期“非理性主义”者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以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掀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迅速渗透到包括历史、文化批评等其它人文学科乃至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股至今方兴未艾、蔚为大观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从地域上看,这股从欧洲大陆掀起的后现代文化批判思潮,不可避免地也迅速传入当代一贯以分析哲学为主流的西方“学术高地”的美国。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承袭这股文化思潮一部分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学术界的世界性热点,其标志是 1978 年堪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大师的阿拉伯裔美国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出版。

后现代哲学对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显而易见。萨义德所主要批判的就可以解读为后现代哲学家福柯意义上的东方话语。中外学术界对两者理论上的差异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从一个角度看,与后现代理论相比,后殖民文化理论贡献最突出领域,是关于学术思想史和学科史的写作,这一点在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事实上,后殖民理论中蕴含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不满足于传统的学术史或学科史的所谓“客观性”描述,而侧重检讨“学科行为”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从而为重新检视“现代性”和东西方两者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

收稿日期: 2002-07-02

作者简介: 施爱国(1970—),男,安徽安庆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中美关系研究。

¹ 关于“Orientalism”的译法国内学术界存有争议(具体可参见王宇根所译《东方学》第3页;罗厚立《“东方主义”与“东方学”》,《读书》2000年第4期)。当侧重作为思维和话语方式的“东方主义”含义时,笔者在文中将其称作“东方主义”;当侧重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学科的“东方主义”含义时,将其称为“东方学”。

二

萨义德《东方学》一书内容的核心是对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行基本的描述,同时试图揭示隐含在传统东方学研究中的权力话语及其运行机制。因此,萨义德在书中将‘东方主义’界定为包括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权力话语方式的三种含义¹。他同时指出上述多种含义‘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1](p.3)。

因此,历史上西方人有关东方的‘话语’都归入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萨义德从这种权力话语角度‘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1](p.4)。他同时不无深刻地指出:‘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1](pp.4~5)

自东方学产生以来,世界就被划分为两个部分:西方和东方。西方是理性和进步的本土,亚洲是捉摸不透而神秘的‘异邦’。自西方人的‘亚洲’概念产生以来,亚洲就代表着一种潜在的威胁,它在西方人的学科体系里无法解释和操作,因而可能在未来对西方构成挑战。自西方白种人在这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以来,理性、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而爱好和平几乎就是西方的代名词;而非理性、偏狭、无逻辑、淫荡而残忍、天生暴力倾向等就经常与东方联系在一起。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对欧洲人而言的‘东方威胁’的问题。他认为,东方总在西方‘对熟悉的东西的轻蔑和对新异的东西既兴奋又害怕——或者说恐惧——这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不定’[1](p.74)。“早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The Persians)中,东方就由一个非常遥远而且经常充满凶险的他者被转化为人们相当熟悉的形象”[1](pp.27~28)。他指出对欧洲人而言,自8世纪以来,伊斯兰就成了恐怖、毁灭、邪恶和乌合的野蛮人的象征,从那以后,“奥斯曼的威胁”一直潜伏于欧洲,代表着一个对欧洲文明的永久威胁。他写道:‘最终欧洲逐渐将这一危险及其全部传说、其重要事件和人物、其善与恶包容并编进了自身之中,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1](p.75)

三

《东方学》一书中论述的主要是历史上欧洲人的‘东方主义’。事实上,历史上美国人的‘东方主义’显而易见。美国的区域研究学就是二战后美国出于霸权的需要对世界格局进行划分的产物,它一直应用着早期‘东方主义’的观念来组织世界知识。萨义德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了美国人的‘东方主义’。他认为,自二战结束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代替英法占据中心之后,‘此时美国发现自己正好处于最近被英国和法国所空出来的位置’[1](p.372)。“19世纪美国关注东方的方式已经为其后来对东方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用心做好了准备”[1](p.376)。在他看来,‘自冷战以来美国政府鼓吹的‘世界新秩序’论调——那种令人陶醉的弹冠相庆,不加掩饰的沾沾自喜,以世界为己任的自我标榜——在很大程度上也许早在康拉德(Joseph Conrad)^④的霍尔洛德身上表现出来了:我们是天下第一,我们注定要领袖世界,我们维护自由和秩序,等等,不一而足’[2](pp.169~170)。在他看来,“华盛

¹ 萨义德所指称的这一学术研究学科是指西方那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等在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时对东方所做的‘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或‘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所谓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指对历史上西方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帝国官员而言,‘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的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上述这些人总是按照东、西二分法“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mind)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所谓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这一含义更多地是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

^④ 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英国作家,《诺斯特罗摩》(Nostromo: A tale of the Seaboard)一书的作者。

顿政府和西方大部分政策制定者和知识分子新近的态度比起康拉德的观点来并没有什么改进”。“我们耳闻目见的美国流行的种种政策制度，实在令人沮丧……然而，竟有人矢口否认这一点，侈说我们‘另当别论，与帝国无关，不会重复老欧洲列强的错误。可是，正如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所证明的，与这种侈口否认伴随而来的正是不停地犯这种错误。更糟糕的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新闻记者们竟和这些做法沆瀣一气……他们这些人在内政事务上常常持进步立场，充满令人仰慕的正义感，而一旦牵涉到海外真相，他们便完全是另一副嘴脸”^[2](p. 177)。就美国关于东方权力话语方式之一——关于东方威胁的话语，他指出，当代的伊斯兰威胁仍是许多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一块心病，而 70 年代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了成功以后，“伊斯兰恐怖症”又一次得到了更新，原教旨主义更是被列为后冷战时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大敌和威胁。

《东方学》一书所指称的“东方”主要是指伊斯兰世界。萨义德认为对美国人而言，“所谓‘东方’更可能是与远东（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联系在一起”^[1](p. 2)。萨义德所言大体没错。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几乎完全被美国人继承下来并适用于美国人一直以来对待远东——特别是中国。伊萨克斯（Harold R. Isaacs）在《美国的中国形象》（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一书中指出，对许多美国而言，中国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以相互对立的两方面出现——从马可波罗到赛珍珠，从成吉思汗到毛泽东。马可·波罗和赛珍珠的名字让人想起中国古代辉煌的文明和中国人的美好品质，而成吉思汗和他的部落“却具有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形象：残忍、野蛮、无人道、没有个性、难以渗透、势不可挡的数量、一旦放松便不可压制等。沿着这一形象，我们可以发现难以对付的、奇异的野蛮性：杀害女婴、妇女缠足、凌迟、刽子手、义和团和黄祸，对苦痛、死亡或人类灾害的毫无感觉和漠视。所有这些奇异的、令人恐惧的形象堆积于正在苏醒的巨人周围，这种形象通过毛泽东那如洪水般横跨鸭绿江的‘人海’，再次得以活灵活现，此时数量众多的野蛮人不是手拿大刀，而是以大炮、坦克和喷气式飞机武装起来”^[3](p. 77)。而且，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多种族国家，美国对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东方主义”还一直表现在美国国内的历史上¹。史景迁指出，自 19 世纪中期第一批中国劳工来到美国之后，经一系列美国作家的塑造，“导致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敌对的原型：19 世纪晚期美国有关‘中国城’的小说被情绪化地等同于傅满洲（Fu—Manchu）^④的世界”^[4](p. XV)。

“黄祸”、“赤祸”等“中国威胁”的观念无疑是西方人长久以来头脑中存在的有关中国的一个“形象”，而“中国威胁论”无疑就是表现这个“形象”的一系列“套话”。“套话”不仅具有无限的和反复可使用性，同时还具有时间性。自 13 世纪蒙古人西进欧洲以来，关于中国人阴险狡诈、非理性、堕落、不可信、好斗的暴力倾向性等关于“中国威胁”的话语，一直是西方人历史上描述中国和中国人的有关知识中的一部分，这大量体现在历史上欧洲和美国的汉学家、后来的区域研究家以及当今的政治战略家等“鸿儒”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心性”的描写中。从成吉思汗、傅满洲到义和团的“暴民”，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黄祸”到 1949 年以后的“赤祸”，在西方人的中国观中，“中国威胁”从未消失，一直延续至今。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让人回味的是，长期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亚洲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伊斯兰在历史上一度是整个亚洲的代名词。直到 17 与 18 世纪，认为亚洲是以伊斯兰为中心的观念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史景迁指出，在早期欧洲人写的史书和文学游记中，中国就常常被称为穆斯

¹ 关于美国国内的“东方主义”可参看：Mae M. Ngai: “American Orientalism”,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ume 28, Number3, September2000; Timothy A. Hickman: “Drugs and Race in American Culture: Orientalism in the Turn—of —the Century Discourse of Narcotic Addiction”,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2000.

^④ 傅满洲是早期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个中国人的原型人物，在关于傅满洲的一系列电影中，他被刻画成一个狡猾、偷偷摸摸、背信弃义和凶恶的角色，这个中国人不仅绑架那些无助的妇女（特别是美丽的白人女性），而且经常面不改色地向茶杯中投毒。

林国家。他还以西方作家格莱特(S. Gueullette, 1663—1776)为例,指出在其作品《中国故事集:达官冯皇(Fun—hoam)的奇遇》(成书于1722年)一书中,中东与中国几乎被混为一谈或随意联系起来[5](pp. 36~43),“伊斯兰几乎成了东方的全权代表”[1](p. 97)。美国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所谓的伊斯兰“绿祸”和中国的“黄祸”联系在一起的确是有历史渊源的。他延续了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对东方的偏见。对亨氏而言,重要的是,无论伊斯兰还是中国,都是他眼中的“东方”,而“东方”对于西方来说一直就是邪恶和危险的。于是,中国与伊斯兰被混淆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对西方世界的最大的“威胁”。

四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和东西方关系处于变动和分化组合之中,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所谓“中国威胁”的论调,其中在美国更是出现了一个“新中国威胁学派”(the New China Threat School)[6]。巴恩斯(Joe Barnes)认为这一“学派”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分裂性的最有争议性的议题”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派别“党派之争中持续不断的话题”的争论的背景中产生的。这些“新的凶事预言家们”(the New Cassandras)根据现实主义外交理论认为中美冲突将会在远东甚至全球展开;他们敌视北京的政权;“夸大中国现有的和将来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目前和将来的军事能力,并把中国等同于前苏联。

“新‘中国威胁’学派”的“话语”在表层上与早期的西方“黄祸论”和后来的“赤祸论”相比,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确有它的“新奇”之处。就东西方关系而言,这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认为,“黄祸”正和“绿祸”一起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提出了挑战。未来的世界将是“文明的冲突”;就东亚地区安全来说,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日趋强大的中国将损害东亚地区的稳定,威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甚至把“中国威胁”体现在人权、贸易、军售等问题上,还与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捐款”等内政问题联系起来。

然而,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在思维和权力话语方式上,其对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东方主义”的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东亚经济的腾飞和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意识的加强,西方人就开始重新构造有关“黄祸”的神话。可以说,90年代的“中国威胁论”把这个神话推向了极至。在美国新闻媒体的强势鼓噪下,它激起了那不死的过往的经验,唤醒了那一直以来沉睡的有关“黄祸”的“记忆”,演绎了一幕堪为洋洋大观的新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一片鼓吹声中,那些一贯标榜“客观”、“中立”的从业新闻媒体的政治评论家和标榜“科学”、“理性”的国际政治战略家们是宣扬“新中国威胁”的主将和斗士。

美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使得他们在塑造中国形象时经常是先入为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威胁”的“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参与创造过程中的人员,不仅仅是那些媒体从业人员,更多的是依据所谓“科学”和“客观”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进行研究的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和战略家们。

应该说,《东方学》一书更多关注西方人文科学层面上的“东方主义”,萨义德对作为一个社会学科的西方国际关系学层面上的“东方主义”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从严格意义上说,萨义德只是一位文化批评家。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层面上的“东方主义”色彩毋庸置疑。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证明,把知识进行“纯知识”和“政治知识”的区分在现实中是很难运用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场合中形成的,东方学的知识更是如此。沃勒斯坦曾指出,“当东方主义在十九世纪变得世俗化以后,其活动的形式也没什么特别的不同”,“他们(指东方主义者)继续依赖一种二元的社会观。对于基督教/异教徒的狭隘区别,他们以西方/东方或现代/非现代的区别取而代之”。他指出了具有两极倾向的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后果是导致了“东方主义确立了欧洲占支配地位的权利”。

力的合法性,它在为欧洲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内的作用进行的意识形态辩护中,确实起着一种主要的作用^[7]。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一个分支的西方国际关系学,其本质上蕴含的‘西方(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和意识形态性不可避免,从一定意义上说,自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带着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弱肉强食’的味道。在东西关系方面,它总是‘服务’于过去赤裸裸武力征服式的旧殖民主义以及今天表面温文尔雅式的‘新殖民主义’。它毫无疑问构成萨义德所称的‘东方学’的一部分。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略家们正是运用这种国际关系理论上的‘话语霸权’来创造‘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张曙光认为,用历史的和批判的眼光看,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华战略决策存在着结构上的局限性与主观上的非理性。他指出这种非理性及其在决策层面上的影响的表现之一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决策在‘利益’与‘威胁’认知与界定上出现严重混淆。用他的话说来说,‘假若按照‘理性选择’的逻辑,对战略利益以及外部威胁的认定与判断,应该遵照利益在先、威胁在后的程序。然而‘冷战’期间的美国决策者们,往往更多地以‘威胁’定‘利益’^[8]。其实,自冷战结束后一直到今天,美国的对华战略仍没有解决好决策结构上的局限性与主观上的非理性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并由此引发的关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讨论便是这种“局限性”和“问题”的表征。中国的日趋强大和中国威胁本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对那些心存偏见的人,他们的思想就象眼睛的瞳孔,光线愈强,收缩得就愈厉害。

五

人类的任何行为总是有其深刻的心理背景。萨义德认为西方的东方学者把东方视为潜在的危险,是为了给西方提供一个作为‘对手’或被‘操纵’的对象,而‘操纵危险’就是对自身的安全感的负责。作为西方理论的一个神话,历史上以来的有关“中国威胁”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同时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在历史中,它变化的往往是其来源,而不是其本体。从使用的意义上说,‘中国威胁’已成了一种严格的道德和认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中国已经被‘威胁化’了,这一过程使历史上和眼下一部分西方学者和其他人士将‘中国威胁’纳为自己的“工作领地”。在这一“领地”上,‘中国威胁’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了对学术判断的功能性表述,而不是对相关材料本身的表达,中国得到了机械的图式化的处理。‘中国威胁’同有关中国的其它观念一起,成了一种先验的、具有宇宙论色彩的必然性。从此,在西方许多有关中国的“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评论中,在西方许多有关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解释中,‘中国威胁’经常能找到它的一席之地,‘象任何其他解释一样,必须首先考虑个体、群体、国家、种族的各自的归属,各自在普遍的宇宙图式中的合适位置’^{[1](p. 90)}。由于其本体论的根源,它无法逃脱和改变,而且为了巩固这一本体论,还需要对‘威胁’的中国和‘爱好和平’的西方进行无休止的确认。东方的‘中国威胁’从此被一部分西方人当作真正的中国接受下来了。在这一“宇宙图式”中,中国不能对自己的位置作出重新安排,中国如要“反抗”(在当代可解读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强国努力),似乎就恰恰证实了这部分西方人‘中国威胁’的看法。诚如张隆溪在《非我的神话》一文中指出:“其实那怪异的非理性及其对西方思维的破坏,中国作为非我的象征那陌生异己的空间以及摧毁秩序和逻辑范畴的威胁,这一切原来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人的虚构。不过那虚构却产生于一种真实的需要,即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建立一个框架,使他得以把自我区别与异己的非我,勾勒出西方文化作为一自足系统的轮廓。”^{[9](p. 191)}

比较文学经常把这归之于人们‘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的关于‘他者’形象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并指出也许那是人类无法克服的认识上的一个真理。然而,归之于这种对‘他者’的“误读”只是揭示了事物的一个表象。“套话”是历史的,从本质上看,“套话”的产生和消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取决于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关系对比^{[10](pp. 206 ~ 207)}。知识与权力的“共存共谋关系”是自启蒙时

代以来西方“现代性”的一个显著特征。“话语”往往意味着权力,“话语”经常是以“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萨义德强调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在《东方学》一书中,他对“东方主义”背后隐藏的实质——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并无太多着墨。人所共知,“东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它反映的一种西方对东方的支配和综合统治关系。“东方主义”话语中蕴含的力量是与现实中的西方政治、经济霸权联系在一起的。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出现有关“中国威胁”的“话语体系”,也应作如是观。

西方的“现代性”将“理性”独立出来变成自在自为的主体,从而将世界变成与之对立的客体,西方人的“真理”就是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符合,正是这种“真理”构建了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大厦。从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来看,在面对非西方世界时,西方人习惯于将“西方”独立出来,让其变成又一个自在自为的主体,而将非西方世界变为与之对立的客体。因此,“理性”的下面掩盖着的是奸诈的权力关系和二元对立式敌对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 W·萨义德, (王宇根译). 东方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999.
- [2] 萨义德. 文化与帝国主义导言[A]. 萨义德, (谢少波, 韩刚, 等译). 赛义德自选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3] 哈罗德·伊萨克斯, (于殿利, 陆日宇译). 美国的中国形象[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99.
- [4]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M], W. W. Norton Company, 1998.
- [5] (美)史景迁, (廖世奇, 彭小樵译).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6] Joe Barnes, *Slaying the China Dragon: The New China Threat School.*, 1999 by the Baker Institute at Rice University, available : <http://bakerinstitute.Org/pubs/workingpapers/claes/scd.html>.
- [7] 沃勒斯坦. 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J]. 读书, 1998, (2, 3).
- [8] 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一般性思考[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1, (2).
- [9] 张隆溪. 非我的神话——西方人眼里的中国[A]. 史景迁, (廖世奇, 彭小樵译).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10] 孟华. 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A]. 乐黛云, 张辉. 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Orientalism” and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the Theory of China Threat in Times of Post-Cold War”

Shi Aiguo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Summary: “Power the mode of discourse” is one of the connotations of E. W. Said’s Orientalism. In post-Cold War America, the statement of China threat is a theory plus a system of discourse to form an all-round theory of China threat which has spanned a long time being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antagonistic dualism in the intention of pursuing supremacy over the world, the American Orientalism by its essence explains that there appears in the post-Cold War times the drumming of the “theory” of China threa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Key Words: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Theory of China Threat